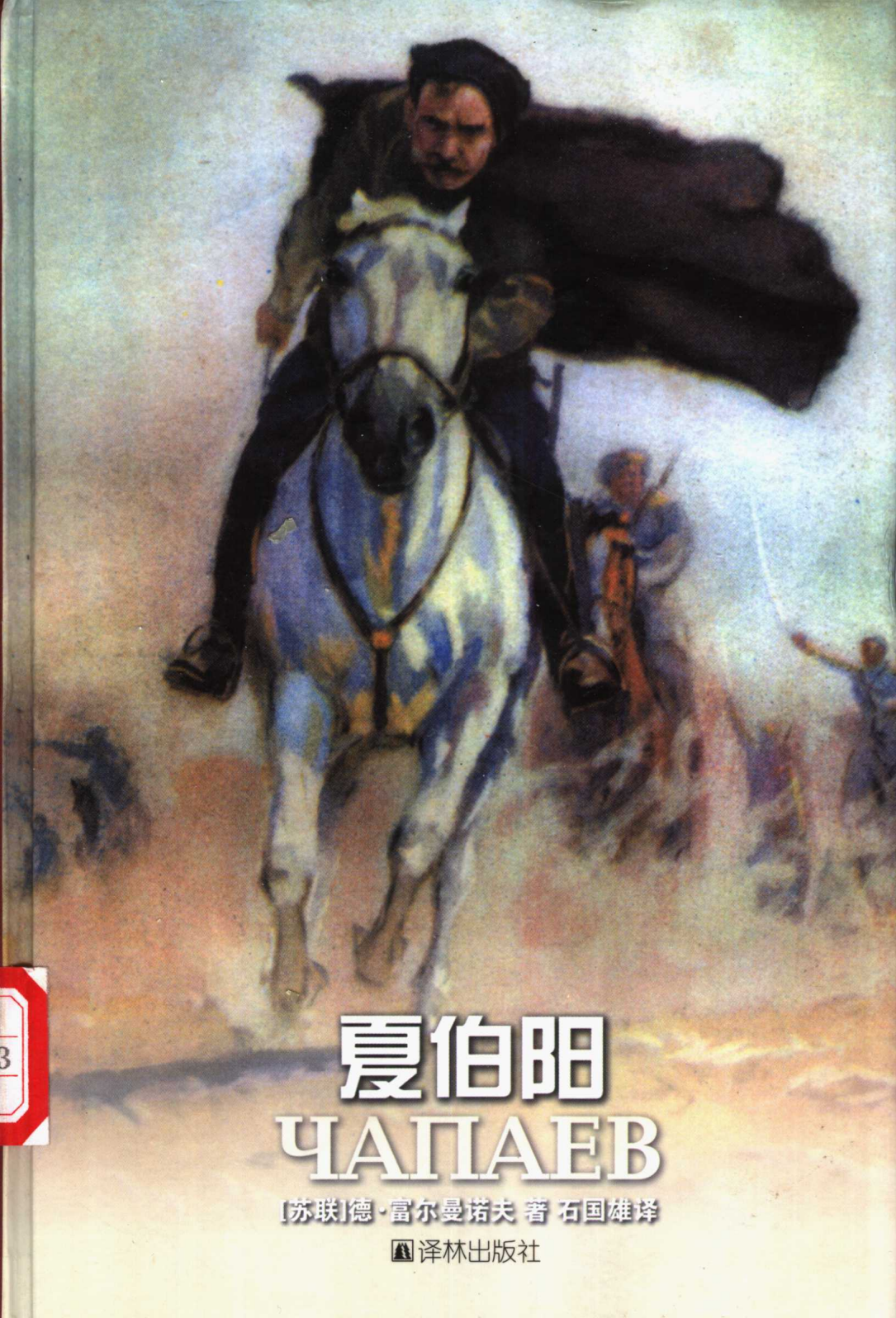




3

夏伯阳 ЧАПАЕВ

[苏联]德·富尔曼诺夫 著 石国雄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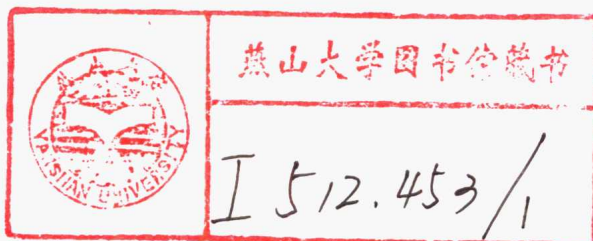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夏伯阳

[苏联]德·富尔曼诺夫 著 石国雄 译

ЧАПАЕВ



13



0653821

-25



译林出版社

译 序

石国雄

文学史上可以看到,有的作家以其全部创作而名垂青史,有的作家则以一部作品而载入史册。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1891—1926)就属于后一种情况。短暂的一生未能使他留下丰硕的创作(其他主要作品尚有《红色陆战队》、《叛乱》),可是一部《夏伯阳》却引人瞩目,成为年轻的苏维埃新文学的重要作品。

《夏伯阳》发表于1923年,主要描写了1919年1月至8月苏联红军在国内战争东线与高尔察克及白卫哥萨克作战的经历。在此之前,年轻的苏维埃文学已经有了一些反映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作品,如皮利尼亚克的《荒凉的年代》(1921)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把革命和国内战争描写成是群众的自发行为,是无政府主义之举。作者们在描写群众力量伟大的同时,也往往把无政府主义、游击习气看成是革命的主要方面,忽视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笔下,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往往比较概念化、公式化,缺少个性;描写新人多半浪漫主义激情有余,缺少冷静客观的社会心理分析。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恰恰弥补了这些不足,在主题的开掘和形象的塑造上都有了新的突破,由此在苏维埃文学中开始了反映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新的一页。

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确实存在着自发情绪、无政府主义倾向、游击习气等现象。富尔曼诺夫的

《夏伯阳》丝毫没有回避这一真实。小说中对于红军部队没有纪律,抢东西,搞女人,对布尔什维克有偏见,没有党员干部,没有政治工作,对军事专家有怀疑,战利品不上交,战斗中不顾全局而抢功等等都作了具体的描写。很难想象,依靠这样的军队革命能取得成功,国内战争中面对强大的敌人能取得胜利。

与当时一些作家不同的是,富尔曼诺夫没有用纯客观的或自然主义的,欣赏的或颂扬的态度来肯定这一切。他从党性立场上批判地描写了这些现象,更把注意力放在布尔什维克如何提高广大红军战士的觉悟,制止和克服这些错误上,显示了“新世界的美在痛苦中,在同旧世界的激烈搏斗中诞生”,“这个诞生的过程是在斗争中,特别是在同‘自发论者’所赞不绝口的东西进行斗争中完成的。”^①例如,我们看到,红军战士在抢了老百姓东西后,怎样在政委克雷奇科夫和师长夏伯阳的说服教育下,把东西归还老百姓;红军战士与当地妇女发生关系后,怎样面临严肃的处理……这一斗争包括了政委克雷奇科夫对夏伯阳的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包括了由工人阶级组成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对夏伯阳师其余各团的影响,自然,也包括了政工人员所做的大量政治宣传工作乃至剧团的演出等等。正是有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坚持不懈的斗争,才使基本上是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能够成为在任何条件下都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决不后退的军队。这是革命和国内战争能取得胜利的保证,也是新生政权能得以巩固的前提。

新人的形象是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文学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新的文学需要有新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有鲜明性格的;应该是活生生的,在革命斗争中成长形成的。在《夏伯阳》

① 梅特琴科著《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90页。

之前,新的文学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来。对于怎样塑造这样的形象,富尔曼诺夫曾经在日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把恰巴伊^①如实地写出来,连同一些细枝末节、一些过失、人的五脏六腑全部写出来,还是像通常那样,把他写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也就是说,是非常出色的、可是在许多方面却是被阉割了的人物?我更倾向于前者。”^②

夏伯阳是个农民出身的红军将领,他对敌人充满仇恨,对苏维埃政权无限忠诚;他作战骁勇,身先士卒;他具有军事指挥才能,一切考虑仔细周到;他忘我地工作,通宵达旦地研究军事问题;他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受群众爱戴……小说生动而具体地展示了夏伯阳性格中值得赞赏的一面,同时也无情地指出了这个英雄人物身上的种种缺陷:他刚愎自用,脾气暴躁,态度粗暴;他政治上不成熟,对“司令部”不信任,虽已入党,对党纲党章知之甚少;他愚昧无知而容易轻信;他也爱虚荣,沾沾自喜于对他的赞许和仰慕……富尔曼诺夫通过政委克雷奇科夫的观察,通过熟悉了解夏伯阳的干部战士之口,通过夏伯阳本人的言行,塑造出一个有棱有角的人物形象。对这个形象的刻画是多方面的,既有军事上运筹帷幄、战斗中英勇顽强的描写,又有生活中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表现;既有正面的褒扬,也有反面的批评。这个形象不是个一成不变已经定型的形象,而是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形象。作者显示了夏伯阳从一个农民、一个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草原上的野马”、“蒙了双眼的雄鹰”,成为革命队伍中不断完善自己的忠诚战士、人民爱戴的英雄。正如夏伯阳自己所说,“您以为,每个人都怜惜自己的生命?有人不仅不怜惜,而且有时还不把它当一回事。比如我吧,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兵,我算什么,打不打死我,对我来说全是一样的。我

① 恰巴伊即夏伯阳。

② 《苏联作家自述》,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第119页。

这样的小虱子,谁需要呢?我这样的人,要多少有多少,我把自己的命看得一文不值……敌人的战壕离我们只有三百步,我却跳出来,而且大声喊叫:哼,别想打中我……有时候还站在土岗上跳舞,想都没想过会被打死。后来我看到,人家开始看重我了,结果呢,我也像个人了……我越是职务升得高,生命对我来说就越宝贵……我对自己说,你这个机灵鬼不是臭虫,而是真正的人,而且想像像样样地生活,好好地生活……并不是变得贪生怕死了,而是变得更理智了。现在我不会再在战壕上面跳舞了,这是胡闹,老兄,我不想白白地把命送掉……”这一段话鲜明地体现了同样身在军队、同样在战场上战斗的夏伯阳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不同认识,深刻地反映了主人公精神面貌的变化,揭示了革命使千百万夏伯阳这样的普通人真正认识自己并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人道主义本质。

夏伯阳虽然是国内战争中一个真实的人物,可是他的形象无疑是有典型意义的。夏伯阳的生活道路是千百万群众经历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夏伯阳的形象才深入人心,为人们所传颂。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政委克雷奇科夫也是一个全新的形象。富尔曼诺夫作为“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①,自然能更好地理解布尔什维克战士是怎样的人,在他的笔下,克雷奇科夫完全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人,是一个鲜活的形象。

我们看到的克雷奇科夫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他具有常人一样的某些思想和情感。作品中真实地描绘了克雷奇科夫第一次经历战斗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这里丝毫也没有美化布尔什维克政委的描写。作者强调了任何人都只有经过实际的锻炼才能成长的硬道理,即使是布尔什维克政委也不例外。也许,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克雷奇科夫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并努力在革

^① 《鲁迅论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90页。

命斗争的实践中克服它们。事实证明,他在战斗洗礼中成长了,他再也没有胆怯,也能真正勇敢地面对枪林弹雨了。同样,克雷奇科夫也不是个对一切无动于衷的人,战争中的牺牲、生命的消逝同样引起他的怜惜和思考,与长久相处的同志们离别同样引起他的伤感……这些描写并没有贬低人物的形象,相反使形象更加真实地凸现在面前。

作品中主要描写了作为政委的克雷奇科夫对夏伯阳所进行的思想教育和影响。在政治思想上,无疑,他比较成熟的。他善于思考,敏锐地发现并深刻地分析夏伯阳存在的问题;他注意工作方法,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去帮助夏伯阳;他耐心细致、恰到好处地制止和纠正夏伯阳的一些错误言行;他理解、爱护、维护夏伯阳,赢得了夏伯阳的信任和爱戴;他谦虚谨慎,并不因为是政委而盛气凌人……这一切使我们看到了作为思想政治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委的形象,通过这一形象也更具体地说明了,革命何以能使像夏伯阳这样的人成为真正的人民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不是一般地呈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也不是简单地罗列某些现象,而是在描写性格特征和某种现象的同时,冷静而严肃地对它们进行社会的历史的分析,充分显示出作家的深刻的洞察力和思考力。

比如作品在谈到夏伯阳是个英雄这一点时,一方面比较了工人出身的英雄与农民出身的英雄的不同,指出了夏伯阳“体现了农民中长期积累而不可遏止的自发反抗的愤怒情绪,但是,这是自发势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夏伯阳之所以成为具有号召力的领袖式人物,是因为“他把自己——一个人的受爱戴和崇高的威望——与自己的师联系起来,融成整体,用英雄主义精神、强烈的热望鼓舞它奋勇向前,鼓舞它去夺取胜利”,“他出身于未经训练的半游击习气的农民群众之中,他能使他们激动到极点,能用他们所希望、

所要求的东西去满足他们。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置于他们的中心”,指出了夏伯阳和他手下的指战员那种互为依存的血肉关系,“夏伯阳的伙伴们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是夏伯阳的战友,因为照耀着夏伯阳的荣誉的光芒也反射到他们身上”,而夏伯阳也知道,“他个人的荣誉正是靠了西佐夫这样一批人才建立起来,保持下来,发扬开来的”,最终则指出了产生夏伯阳的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只有在那个岁月才有夏伯阳式的人物,在别的岁月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他是在那个时刻、那种情况下,由那样的群众产生的。”

这样,通过对夏伯阳是英雄这一问题的思考,这一形象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个别的人,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现象的体现,也就使人们能更客观更深刻地认识这一形象。既看到他的个人的长处,又看到他的历史局限性,比起只是具有某些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来,无疑有着更多的内涵。这种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开辟了苏维埃新文学的新途径,对于深化主题、塑造形象有着积极的影响。

《夏伯阳》作为苏维埃新文学的早期作品,其主要成就是在思想内容上,正像高尔基当年指出的:“这两本书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意义超过了它们的艺术的意义”,“您是像一个目击者那样地在叙述,而不是像一个艺术家那样地在描写”。^①

这也许与作者只想真实地再现人物和事件,没有在艺术上多加修饰的初衷有关。他说:“一、为了实际的战斗的革命的目的,说明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是怎样战斗的,不搞离奇曲折的东西,不虚伪,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让广大工农群众看到它和闻到它的气息……二、……我没有把这两本书看作是纯艺术作品……因此形式就与众不同,因此那里面就有文件、电报、宣言等等。我写的是

^① 《苏联作家自述》,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第124,135页。

历史的、科学地整理过的东西,同时又给它们加上了艺术形式。”^①他也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确定为小说,在1922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对作品体裁的考虑:“1. 中篇小说……2. 回忆录。3. 历史纪事……4. 艺术历史纪事……5. 历史抒情叙事……6. 情景写照。7. 历史随笔……”但是直至发表时他也没有确定。这样一些因素使作品在艺术上显得比较幼稚,在语言上比较平淡,克雷奇科夫的形象也不够丰满。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夏伯阳》在艺术上毫无可取之处。作品在体裁上综合了小说、历史文献特写、传记等因素,塑造了夏伯阳的鲜明形象,一些细节的描写很逼真,一些比喻也用得颇为生动……这些特点还是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艺术价值。

尽管存在缺陷,《夏伯阳》毕竟是一部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国内战争的作品,毕竟是一部为苏维埃新文学带来了新内容的作品,毕竟是一部对后来的文学产生过影响的作品(如绥拉菲摩维奇、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的创作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战壕文学),毕竟是一部鼓舞了许多人的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和平建设和卫国战争时期都有以夏伯阳命名的突击队、战斗队。1934年作品拍成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因此,今天重读《夏伯阳》并非是没有意义的。正像卢那察尔斯基所说:“《恰巴耶夫》^②一书是我国革命后的小说中的突出成就。只要你开始读它,你就不能释手。读完它,你就能获得丰富的关于我们国内战争的内在和外在特点的真实的重要的知识,就有一种在读者胸中所产生的革命热忱的新感情。”^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主人公姓的译法采用了“夏伯阳”,按现在通行的音译应取“恰巴耶夫”。考虑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知道

① 转引自维霍采夫主编《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1979年,第217页。

② 即《夏伯阳》

③ 转引自《俄罗斯苏维埃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281页。

“夏伯阳”而不知道“恰巴耶夫”，所以还是沿用了过去的译法，权作约定俗成处理。

目 录

一、 工人支队	1
二、 草原	16
三、 乌拉尔斯克	32
四、 亚历山德罗夫盖	42
五、 夏伯阳	51
六、 斯洛米欣斯克的战斗	69
七、 途中	101
八、 向高尔察克进攻	126
九、 战斗之前	138
十、 向布古鲁斯兰进军	150
十一、抵达别列别伊之前	185
十二、前进	222
十三、乌法	246
十四、解放乌拉尔斯克	264
十五、结尾	273

一 工人支队

车站上非常拥挤。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红军战士沿着月台拉成一条人链，勉强才挡住欢腾喧嚣的人群。伏龙芝召集起来的一支工人支队，今天半夜就要出发去打高尔察克。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各个工厂的工人都聚集在这儿，要为自己的同伴、兄弟、父亲、儿子……送行。这些新“兵”既流露出困窘又有些幼稚，显得有点可笑：他们中许多人还是第一次穿上军大衣；大衣穿在身上并不合体，四周都不贴身，鼓鼓囊囊的，就像发了酵的面团。但现在哪儿顾得上这点！它无碍于这些小伙子成为雄赳赳气昂昂的战士！瞧这一个用皮带把腰束得像“高脚酒杯的脚”，几乎透不过气来，可是走起路来却神气得很，鞋后跟踏在地上咯咯直响，可爱得很；瞧那一个，他英姿勃勃却又漫不经心，腰间的军刀挂得很别扭，可他却摆出一副老行伍的样子，一只手按在刀柄上，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和身旁的人在争论着什么；再看第三个，他左腰侧挎着一把手枪，右边则挂着两颗木柄手榴弹，子弹带像蛇一样缠在腰间，现在正急匆匆从月台的这一头走向另一头，想在朋友、亲人和熟人面前炫耀自己威武的仪容。

那黑压压的势不可挡的工人团体怀着骄傲、热爱的心情，怀着毫不掩饰的欣喜望着他们，谈论着他们。

“他们会学会打仗的，老弟，会学会的……到了前线——就会尝到他妈的打仗的滋味了……”

“你以为什么——在前线可不是躺在摇篮里晃荡……”

大家动弹起来，笑了起来，脖子朝前伸得长长的。

“瞧都认不出捷连季了，在焊接车间的时候浑身油腻腻的，像

根灯芯似的，可现在你瞧……有多神气……”

“瞧他那副洋洋得意的样子，真没说的……他那把军刀就像是将军的佩刀一样，瞧，晃来晃去的。”

“捷连什，”有人逗笑地喊了一声，“把军刀塞到口袋去，别让哥萨克抢去。”

站在近旁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你妈会拿去砍白菜的……”

“捷连什卡，你绊一下，就会把刀弄断的……”

“你会割破手指的……真是半吊子将军！”

“啊哈……噤——噤——噤。哈——哈——哈——哈……”

捷连季·博奇金是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脸上有雀斑，长着一头浅棕红色的头发。他用善意亲切的目光环顾着开玩笑的伙伴，微微有点害羞，急忙握住歪倒一边的军刀……

“我……要给你们什么瞧瞧。”他不好意思地朝人群威吓着，找不到话来回答，不知道对这充满热情、滔滔不绝的取笑和俏皮话怎么应对。

“捷连沙，你要给我们瞧什么，是什么？”那些打趣的人不肯罢休，哈哈大笑地说，“来，娃娃兵，嗑嗑瓜子吧。这件大衣想必是从牛犊身上剥下来给你穿的吧……啊哈……嘿嘿……”

捷连季含着笑意向车厢走去，消失在一群穿着灰军装的乱哄哄的红军战士中。

每当看到哪个战士穿得不合身，便会哄起一片嘲笑声，刻薄的嘲讽，辛辣的俏皮话像倾盆大雨扑面盖下来……然后又开始谈起正经严肃的事来，人的情绪和谈话的题目都变得很快——有一种神经紧张的、激动而敏感的忐忑不安时时在人们心头闪过。人群中议论纷纷：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能把魔鬼从地狱里揪出来……大家总是发牢骚——什么没有鞋穿啰，没有大衣穿啰，没有子弹打啰……可

是他们，你瞧……”说话的人用手朝车厢那边指着，表示他说的是红军战士，“你看看，装备了整整上千人……”

“你说多少？”

“看来有千把人，那边还在集合——也全都给他们装备好了。只要你想干，就能办到，兄弟，没时间好磨蹭的——现在是什么时候……”

“有人说过，是严峻的时候。”一个沙哑的男低音总括着说。

“是啊，怎么不严峻呢？高尔察克这家伙在拼命向前进攻。你瞧，乌拉尔那边也不太平……”

“唉——”一个老头叹了口气，这是个瘦小干瘪的老头，穿着一件女式短棉袄，冻得直哆嗦，满脸都是皱纹，就像一只干蘑菇。

“是啊……眼下我们的事情又会怎么样，一切可已非常糟了。”一个闷闷不乐的哀愁的声音抱怨着。

有人郑重而严肃地回答他：

“谁又知道呢？事情自己又不长腿，得去做。瞧，一发话，马上就集合起上千小伙子……兄弟，这是件大事情，了不起的事情……听报纸上说，军队里工人少，可需要……工人——他比别的人都更明白事理……就拿眼前的例子来说：比如帕夫卢什卡·洛帕里，可以说是条硬汉……又有头脑，垮不了，没错！”

“那还用说，明摆着……”

“不要说是男人，你瞧瞧她，那个玛尔富什卡，‘穿皮茄克的女人’，她也并不是个等闲的婆娘。”

玛尔法是纺织女工，正好在不远处走过，听到有人在议论她，便迅即转过身，走到说话人跟前。她宽肩膀，阔脸盘，稍稍有些麻点，蔚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三十五岁要年轻得多。她穿着一身新军装：裤子，靴子，套头束腰带的军服，头发剪得短短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

“你干吗要惹我？”她走近来问。

“我干吗要惹你，玛尔富莎，是你自己找上来的。我说了，我们的‘皮茄克大姐’不像个女人，倒像一匹没有鞍笼的母马……”

“这么说我是匹母马？”

“是啊，还能是谁？”突然那人改变了开玩笑的口气，“我是说，你非常像一个军人……就是这话！”

“像也好，不像也好，必须要……”

“明摆着是必须……”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那么，你那里的事怎么办？”

“什么事怎么办？”

“各种各样的事呀！”

“那算什么事，”玛尔富莎双手一摊，说，“把孩子放到孤儿院去了，还能送哪里呢？”

“是啊，还能送哪里……”对方同情地说。

接着他痛苦地叹了口气，用低沉的声音深表同情地说：

“不过，我们会照看的，会照看的，玛尔富莎，你别难过，我们会照看的……你放心去吧，不替你们干点事，我们留在这里干什么？……也许，到时候，我们也要去……是吧？”

“是这么回事……”玛尔法点了点头，说，“肯定会这样……靠一支队伍难道就可以对付了吗？……一定还要去的。”

“那些小伙子们好像也有点那个。”对方朝车厢那边晃了下头。

“他们有什么丢不下的，”玛尔法回答说，“巴不得快点动身呢！说什么，等得都腻烦了。光是听说，要出发了，要出发了，不知还在瞎忙乎什么？……喂，安德列耶夫！”玛尔法朝一个走过去的人喊了一声，“出发的事，那里有什么说法吗？”

一个有一双深蓝色眼睛、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二十三岁，身材匀称，步态灵活，头戴一顶尖顶伞帽，身穿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这就是安德列耶夫！他是彼得堡的钳工，不久前才来到伊万诺沃。他迈着利索的步子走来，就像向上级报告一样，走到跟前时，鞋后

跟啪地一碰，举手行了军礼，漂亮而严肃的眼睛盯着玛尔法，不带一丝笑容地报告说：

“荣幸地报告长官，火车过四十分钟开出！”

玛尔法扯了扯他的衣袖，问：

“我们要不要告别一下？伙伴们都在等着，总得说几句告别的话吧……克雷奇科夫在什么地方？他跑到哪里去了？”

安德列耶夫又行了个军礼，仍然用平静的口吻一板一眼地说：

“报告长官，他正在喝茶涮肚子呢！”

玛尔法打了一下他的手，说：

“去你的，小鬼，你发呆了，是吗？瞧你，把我当作什么将军了……”

他一下子就换了个样，用“本来的”清脆的嗓音对玛尔法说：

“玛尔福奇卡……”

“啊？”

“玛尔福奇卡，你就自己来吧……嗯？”

安德列耶夫噘拢嘴唇，瞪大眼睛，富有表情地做了个鬼脸。

“来什么？”玛尔法朝他瞥了一眼。

“也许，你来说点什么？”

但是玛尔法什么也不回答，踮起脚尖，从人群头上望过去：

“瞧他们自己来了，大概是……”

站在旁边的人也踮起脚，伸长脖子，朝玛尔法望去的方向张望。那边有三个人在走过来，四周团团围着人。看得最清楚的是洛帕里，他有一头又黑又长的头发，眼睛炯炯有神，身材高挑瘦削。他边走边和人友好地打招呼，走起来像是自己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摇摇晃晃，很不协调。

他旁边是叶列娜·库尼岑娜，一个纺织女工，二十二岁的姑娘。在群众大会上纺织工人常常可以听到她讲话。她的话简单聪明，明白易懂，声音铿锵动听，因此大家都喜欢她。她还没有戴尖顶军

帽，依然扎着头巾；也没有穿士兵的大衣，而是薄薄的黑大衣。这可是一月的严寒天气呀！她那苍白而严肃的脸上隐隐流露出内心的喜悦。

叶列娜的旁边是费奥多尔·克雷奇科夫。他不是纺织工人，而且根本不是工人。他从莫斯科回到这里来还不久，滞留下来了，习惯了这里，奔来奔去给人上课，日子过得像只小鸟一样，有什么吃什么。他曾经是个大学生。革命中他很快便发现自己是个不错的组织者，而在会议上他说起话来慷慨激昂，热情洋溢，引人入胜，虽然说的并不总是有道理。工人们非常了解他，喜欢他，把他看做自己人。

站在月台外面的人群一看见库尼岑娜、克雷奇科夫和洛帕里便动起来，大声地议论起来：

“大概马上要开始讲话了。”

“快要出发了……”

“是啊，也该行礼告别了，不是吗，该睡觉了。”

“我们热烈地接个吻，也就完事了。”

“听，铃响了。”

“是第一遍铃吧？”

“第一遍。”

“十二点钟开车……”

“瞧，他们就是要在深更半夜出发。”

那些人有的穿着油污的短大衣；有的穿着破烂的短皮袄，领子上脱了毛，磨光了，袖子很短，肘部已磨破了；有的穿着黑色短上衣——厚呢的，粗呢的，皮的，各种各样。真是别具一格的人群！

车站并不大，能容纳的人不多。机灵些的人便攀在栅栏上，爬上窗台，许多人登上车站的附属建筑物，从那里往下探着头，瞪大了眼睛看着人群，还有人蜷缩着身子，吊在门的木把手上。有些人则抓住檐板，占据了通道，有的在车厢顶上落脚，有的则站在梯级